

獅子山作為浮動能指：

獅子山符號在主權移交時期的意義流轉

壹. 引言

獅子山是香港政治、文化場域的關鍵字。獅子山和其衍生的獅子山精神往往被視為代表香港本土文化論述的重要部份，不同媒體、政治團體不約而同地利用獅子山(作為一個符號)來代表香港，但是它們想像中的獅子山實際上指涉不同概念，因不同陣營將獅子山接合其政治議程，甚至一系列概念是相互排斥。本文視獅子山為一個流動能指，並回答以下問題：

1. 主權移交時期後的不同政治團體如何利用論述形構 (**discursive formation**) 和接合(**articulation**)來為獅子山(作為一個符號)生產新的意義 2. 描述一系列獅子山的符號呈現著甚麼關係。

貳. 文化領導權，論述形構與流動能指

語言學大師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指出一個符號由兩個不同部分組成：能指（聲音、圖像等記號）、所指（概念）。能指和所指被連結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符號。(Saussure, Bally, Sechehaye and Baskin, 1960)

兩者間的連結被稱為指涉作用；索緒爾進而提醒符號的任意性原理：能指和所指的連結從來沒有必然關係，實際上兩者連結具有任意性

（**arbitrary**），因而符號的意義從來不是固定的；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建基於索緒爾的符號學模型，提出指涉作用可分為兩種：明示義

(denotation)和暗示義(connotation)。明示義(denotation)即為索緒爾提出的指涉作用：聲音、圖像等記號和相應概念的結合（如：樹的圖象和樹的概念）。羅蘭巴特更著重的是暗示義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應用，符號本身亦能化作能指，並指向另一個新的所指（如：樹的概念能指向環保、自然）。羅蘭巴特在研究廣告時發現資產階級能操縱暗示義來維持消費者的慾望和意識型態(Barthes, 1972)；福柯對論述的研究亦有助我們理解符號和意義形成。福柯以高度歷史化的方法了解論述：所有論述的存在均是源於特定社會條件才會出現。以上想法不只提醒我們注意符號和論述與歷史脈絡的關係，同時亦警示我們：一些看似是常識不變的真理實際上只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

意大利共產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了文化領導權的概念。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未如馬克思所預見般爆發革命，所以葛蘭西提出文化領導權的概念來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葛蘭西將上層結構劃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政權不只需要依賴政治社會的強制力量和市民社會中的文化領導權。文化領導權需要由社會中因而大多數人自願的認可(consent)而實現，從而使市民承認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和資產階級的統治(Gramsci and Buttigieg, 2011)。霍爾（Stuart Hall）提出串聯(articulation)理論來進一步了解文化領導權的操作。意識是爭奪過程，概念和概念間實際上不存在必要的聯繫（no

necessary correspondence)。沒有必然聯繫的意識形態元素被接合成連貫的話語體系接合指將沒有必要關係的概念和事物連結起來的過程，這個意義穩定和接合的過程正是文化領導權操作的結果(馬，2014)。

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穆芙(Chantal Mouffe)認同概念串聯是文化領導權的操作。拉克勞和穆芙認同符號的意義不能永遠地固定下來，所以他們指出論述場域內有大量不同的浮動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浮動能指的意含並不是完全明確，它亦非空洞(能指涉所有概念)(Laclau and Mouffe, 2014)。浮動能指與其他概念串聯起來並產生具穩定性的論述，固定浮動能指和另一概念的指涉關係被視為展現文化領導權的過程(Laclau and Mouffe, 2014)。浮動能指會被固定成支持某政治陣營政治議程的論述。

符號學明顯地是理解獅子山符號的重要工具。羅蘭巴特的洞見提醒到研究獅子山符號時需要注意符號的暗示義，而本文後來提及的論述實際均是暗示義——不同獅子山論述如何指向不同的社會想像；福柯的高度歷史化的方法不只提醒研究獅子山符號時需注意歷史脈絡和符號意義轉變的關係，亦要以智識考古學的方式來梳理符號意義轉變的進程。拉克勞和穆芙的理念更提醒到符號意義的改變實際上具有政治意味，成功穩定重要符號實際上有助爭取文化領導權。獅子山明顯地是香港的重要文化符號，不

同政治陣營如何串聯獅子山和其他符號以爭奪文化領導權，這是十分有趣的。

參.2019前的獅子山論述形構：兩種自由論述的爭奪

資產階級想像的「獅子山」：經濟繁榮與「獅子山」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及非典型肺炎疫情爆發等事件，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經歷數年經濟疲弱的時期，當時不少經濟數據均反映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正處於一個經濟蕭條時期，例如：2001年12月失業率為6.1%，2001至2003年政府庫房均錄得赤字（香港交易所，2001）。由於面對嚴峻的經濟困局，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2002年的財政預算案（2002）實行大量緊縮經濟政策。為了激勵市民一同共度時艱（支持其緊縮政策），梁在其預算案結尾部分便引用部分《獅子山下》的歌詞。如果獅子山（精神）象徵六、七十年代香港市民努力拼搏向上，改善生活的集體記憶，梁在經濟困難時期刻意挪用《獅子山下》的歌詞在政府文件中明顯地是為了鼓動市民為經濟發展而作出犧牲，例如：梁刻意鋪陳出「香港是我家」的感覺，並指出所有香港人均願意為這個「家」咬緊牙關，總有一天能夠跨越困難。不難發現，此時獅子山代表的「家」並不再代表每個香港人所擁有的原生、實際的家庭一，而是代表被轉喻成「家」的整個香港社會。與此同時，本來是個人奮鬥的拼搏精神被轉化成支持政府施政的召喚和對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渴望，簡言之，獅子山本來象徵著香港人拼搏向上的集

體記憶，但是由於經濟困難和政府官員的鼓動，獅子山慢慢被改造成指涉香港經濟繁榮想像的符號。

獅子山與經濟繁榮想像被串聯起來的工程並未有隨著香港經濟復興而停止，不同政府部門和親政府團體均挪用獅子山作為代表香港經濟繁榮的符號，例如：旅遊發展局將獅子山的輪廓帶入「香港品牌」的標誌設計，當局指出獅子山不只象徵香港人的拼搏精神，同時獅子山亦是香港繁華城市地景的一部分：標誌以不同色彩來繪畫獅子山象徵香港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香港精神」是一個由政商界別中具影響力的人士發起於2010年開展的活動，以上組織每年均會選出一些具備香港精神的人士成為「香港精神大使」。「香港精神」的標誌同樣採用獅子山的輪廓作為標誌的一部分，一群充撐香港天際線的摩天大廈（均與金融業相關，例如：國際金融中心 and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等）則被放置在獅子山以下。細閱「香港精神」挑選香港精神大使的細則，我們不難發現與過往理解的獅子山精神有一定出入：「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積極樂觀」等特質似乎更接近資產階級理想中的創業家形象（而非草根階層），實際上，不少「香港精神大使」均是新興創業家或社會知名人士。從「香港精神」和「香港品牌」兩個例子中，我們能夠發現到獅子山被挪用成再現經濟自由和繁榮景象的視覺符號，以上兩例均視獅子山是為香港繁榮景象和城市地景的一部分。

在理解獅子山如何被塑成經濟繁榮的符號，「獅子山學會」似乎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例子。獅子山學會是一個成立於2004年的香港智庫，由一班支持經濟自由的學者、財經評論員等組成，致力於透過政策鼓催的方式來維持香港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和宣揚自由市場理念。有如前述的「香港精神」和「香港品牌」，獅子山學會同樣採納獅子山的輪廓為其組織標誌的一部分，視獅子山呈現香港經濟繁榮的符號。更具代表性的是「獅子山學會」創辦人（在解釋組織名字由來時）重新演繹了《獅子山下》故事的意涵(The Lion Rock Institute, 2010)：1950年代，數以萬計的人為了更自由和美好的生活而來到香港，在其地標（獅子山）落業歸根。羅文的《獅子山下》敘述香港人的故事——香港人在建設香港的同時亦找到自己的財富，而當時社會亦鼓勵他們自由和富足的生活。

綜觀以上四個例子，獅子山（作為符號）在主權移交早期被挪用成代表經濟自由和繁榮的符號，而非再代表香港市民拼搏向上的集體記憶和情感。即使原文本所代表的集體記憶仍存在於其論述中，但是努力拼搏向上的結果似乎被更為重視，甚至部分團體重新解釋成一種類似企業家精神的意識型態。此時的獅子山（作為一個符號）亦經歷物質化的轉向，一方面其再現方式改為物質化的視覺再現，另一方面香港經濟繁榮的物質性亦被強調起來。換言之，獅子山在主權移交早期與經濟自由的論述形構被接合

起來，政府和資產階級不斷祭出獅子山（精神）的目標是以集體回憶來市民認同和實踐自由放任的經濟型態，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抗爭者想像的「獅子山」：社會運動與「獅子山」

串聯經濟繁榮和獅子山串聯的論述形構深受政府和親建制團體所追捧，甚至如此的串聯曾經變得十分穩固，其意義均受到香港市民的認可。然而，符號和領導權非全由政府或資產階級壟斷，而是開放予社會上不同群體互相爭奪。支撐上述論述的政治經濟條件在2010年代開始出現改變：一系列新社會運動（例如：反高鐵運動、保育天星碼頭等）的興起不只暴露城市發展只著重經濟利益的問題，發展以外的人文關懷漸漸變得重要。同時，部分香港市民亦未能從經濟成長中得益，貧富懸殊嚴重，不少市民認為努力拼搏向上亦不足以改善生活，甚至開始質疑經濟自由論述和經濟發展至上的論述是否有利於香港大眾，例如：地產霸權。被經濟自由論述串聯的獅子山（符號）亦因脈絡的改變而被加上新的意義，甚至我們能夠考察到社會運動參與者和一般市民如何與政治權威和資產階級爭奪獅子山的詮釋權。

2014年10月23日，一群自稱為「香港蜘蛛仔」的攀山運動熱愛者兼佔中示威者登上獅子山山頂，並在山頂上掛上印有「我要真普選」巨型直幡。以上行為似乎只是佔領中環運動的一部分，但從「香港蜘蛛仔」拍攝的影片中可見他們具有重新定義獅子山的企圖。在其影片《為基層》中，

「香港蜘蛛仔」說到：獅子山不應只是談經濟，亦不是不談政治，為公義才是真正的獅子山精神。從「獅子山不應只談經濟」一句可見，「香港蜘蛛仔」或甚背後代表的草根階層並不認同資產階級所支持的經濟自由論述，同時爭取獅子山符號的想像帶來新的可能性(黎國威，2017)。進而，「香港蜘蛛仔」將公義和政治的概念與獅子山串聯起來，不只是為獅子山增加新的意義，並將獅子山接合到其支持社會運動的政治議程中，例如：「香港蜘蛛仔」當時接受《蘋果日報》(2014)訪問時，便指出：有權利選擇自己特首，讓不同階級有向上流動的機會才是真正的獅子山精神。；再現獅子山的方法亦有所轉變，從抽象符號到實體佔領。資產階級對獅子山的挪用多是引用其視覺或文字符號至其組織的符號、演說等中。「香港蜘蛛仔」掛上直幡同時改變了再現獅子山的方式。實際佔領獅子山並進行地景改造不只能夠透過製造視覺奇觀來有效地進行政治宣傳，更重要的是整個地景改造過程實際上是建構集體記憶及重新想像共同體的事件：不論是掛上直幡的抗爭者、遠在山下眺望的香港市民或是在網上轉載和「改圖」的網民，他們均在整個觀看的過程中有共同的觀看經驗。

即使「香港蜘蛛仔」掛上的直幡只在隔天已被政府拆除，然而這種對獅子山的佔領行動和地景改造漸漸成為不同政治立場人士表達意見的方法，甚至爭奪獅子山山頭的佔領權和詮釋權的爭奪是同時間發生的，獅子山漸漸成為表態標誌。自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起，抗爭者均多次在獅子山

山頂上掛起不同訴求的直幡以表達其政治立場(零博客，2021)，例如：

「我要真普選」（2014，2015，2016）、「我們都是林榮基」（2016）

「反送中」（2019）。隨著2019年反修例運動展開，抗爭者對獅子山的地景改造不再限於掛上巨型直幡，抗爭者開始在獅子山山頂展示各種藝術品（例如：巨型燈牌、女神像等）以改造獅子山的地景。最為影響深遠的地景改造是發生於2019年8月23日的「香港之路」人鏈活動，近300名人士在晚上登上獅子山山頂築成人鏈，並利用鐳射燈向山下照射。由於大量市民參與、觀看和及後有大量照片流傳，「香港之路」下的獅子山不只成為最具代表性的獅子山圖象，同時成為象徵反修例運動的事件。

肆.反修例運動後的獅子山論述形構：集體記憶及其重寫

「黃色經濟圈」與懷舊的獅子山

前文所提及到的對獅子山的實際佔領和地景改造在反修例運動後期變得越來越困難，主要原因是警方進一步限制示威者的登山行為。在2019年尾起，抗爭運動的聲勢由於鎮壓力度加大而漸漸減弱，隨著港區國安法的實行，政治抗爭似乎已經變得不可能。如此情況下，獅子山符號已不能再以佔領和地景改造的方式再現，明確地宣傳政治宣言亦已變得毫無意義。故此，與反修例運動抗爭者同源的「黃色經濟圈」生產大量以獅子山符號作標誌的產品，產品生成著不同的政治文化意義。

「黃色經濟圈」生產大量以獅子山符號為標誌的商品，其中最為廣泛流傳的商品是自新冠肺炎爆發後廣泛使用的口罩。由於香港在新冠疫情早期經歷口罩供應短缺的問題，不少「黃色經濟圈」的商家自資在家設立口罩生產線（例如：獅子山口罩、同舟、異度空間工作室等），他們不若而同使用獅子山作為其品牌形象和設計理念。獅子山口罩和同舟均引用到獅子山精神來說明企業成立的背景：在疫情最嚴重時，寄望香港人能共度時艱、齊心抗疫，希望能夠以最便宜的價格來出售口罩予香港市民。上述口罩設計的風格亦有一定相似性，「黃色經濟圈」內的口罩供應商挪用大量具香港本土特色的事物和設計來作為口罩的圖案，例如：霓虹燈牌、傳統小巴牌、紅白藍袋、香港常用口語；除了口罩，不同手工業者均挪用獅子山形象來製作不同家居用品，例如：家居擺設、燈箱和擴香石等。這些產品往往會被包裝成「移民禮物」，用以送給即將移民他國的香港市民。即使以上產品設計各異，但設計的特點均有一些相同之處。第一，「獅子山」符號往往配上反修例運動中出現的常見標語，例如：「加油/香港」的字體、「我地真係好撚鐘意香港」、「Free HK」、「如水（Be water）」等；第二，有別於前述由資產階級所操縱的獅子山符號（標誌背景為白色，而獅子山的輪廓是黑色），黃色經濟圈常用的獅子山圖案配色完全不同：背景多是黑色，而獅子山的輪廓和線條多是白色或者閃爍的銀色，設計明顯地意圖再玩「香港之路」中獅子山的視覺形象。

即使縱多黃圈產品均有不同設計意念，但是這個時間的獅子山符號明顯被放置在重新想象過去的維度：不論是主權移交早期由資本家和政府或者 2010 年代由抗爭者所詮釋的獅子山符號，兩者均是具有想象美好未來的傾向：資本家借用獅子山符號來重拾拼搏精神來維持香港的經濟繁榮；抗爭者則透過不斷改造獅子山地景來鼓動大眾人參與政治抗爭，繼而希望為香港帶來更民主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個時間的獅子山符號則幾乎未有指涉對香港未來的想像，轉而被放置在懷舊過去的維度。再者，獅子山符號與多個來自不同年代的香港文化圖騰和集體記憶放置在一起，例如：70 年代具標誌性的工業製品、香港本土插畫師、傳統粵語流行文化和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的集體記憶。借用詹明信的語言，獅子山符號和不同年代香港文化標記被拼湊成一幅對香港美好過去想像的拼圖。對過去的重構和美化實際上是為懷舊的表徵，懷舊不只有著美化過去和歷史的功能，同時亦隱藏著對現在生活的不滿和焦慮(洛楓，1995)，例如：強調本土文化和語言正是對應當下文化身分被洗去和被融合的焦慮，而隱晦方式來再現 2019 年反修例示威的集體記憶正好對應高強度鎮壓及欠缺未來政治想像的不安。

《獅子山下的故事》與被收編的獅子山

即使《獅子山下的故事》是為一套由中國內地拍攝的劇集，但製作方卻致力於強調《獅子山下的故事》和《獅子山下》的關係，例如：劇集在

宣傳時一直被視為《獅子山下》的新編；劇集多次播放由羅文主唱的《獅子山下》。更重要的是主角一家人整個奮鬥的故事均被冠以和《獅子山下》相同的描述：努力拼搏、同舟共濟。不難發現，《獅子山下的故事》所呈現的獅子山論述與原始和主權移交早期資本階級強調的獅子山論述十分相似。

然而，《獅子山下的故事》所呈現的獅子山論述更強調香港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關係，實際上是正在改寫香港人所想像的香港故事。在努力奮鬥、拼搏向上的故事上，《獅子山下的故事》開添了一個故事的開局和結尾，例如：故事主人公梁闊祖籍佛山的身份和改到香港生活的遷移經驗在故事中被強調，強調故事主人公的祖籍身份與中國官方所宣傳的「血緣種族」論式的香港身份互相呼應——香港人和中國人在血緣上一脈相承；再者，《獅子山下的故事》的結尾是梁闊的茶餐廳離開香港，轉而回到佛山（自己的家鄉）發展，而且十分成功。如此「落葉歸根」式的結局不只呼應了前述的「血緣種族」論式的中港論述（馬傑偉，2006），同時展現出另一種的中港想像：功利式國族主義——願意接納中國人身份並不是「血濃於水」的國族論述，而是在內地市場的實際經濟利益。這不是暴露了港式國族主義從不是以血源（而是以利益為核心）的問題嗎？顯然，《獅子山下的故事》同時祭出兩套互不相容的國族主義，但是終究兩者均有共同目標：帶出香港發展終於究離不開中國控制的脈絡。

伍.總結

本文嘗試歸納到主權移交後「獅子山」（作為符號）的意義如何不斷被改寫，並分析到不同時期的符號如何被納入到各種政治議程中，從而爭取大眾的支持。主權移交早期的「獅子山」符號被資產階級挪用成面對當時經濟困局的修辭，鼓動香港人重拾努力拼搏精神，「獅子山」此時意味經濟繁榮的未來想像和不問政治的個體意識形態。然而，隨著貧富懸殊加劇，本來牢固的經濟自由和「獅子山」串聯關係開始被鬆動起來。自「香港蜘蛛仔」在獅子山上掛起巨型直幡起，「獅子山」的符號意義正正被慢慢改寫：除了經濟自由，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和政治運動亦慢慢與「獅子山」拉上關係。不同抗爭者透過改造「獅子山」地景來宣傳政治行動和意識，從而將「獅子山」置入社會運動的政治議程；基於政治打壓越見強烈，社會運動似乎變得不可能。由於獅子山符號與其他本土文化所串聯「獅子山」由政治抗爭的符號而被改變成與懷念過往香港的符號，同時表達對香港現狀的不滿；為了重新收編香港，中國內地的文化作品便嘗試重新改編《獅子山下》和香港故事，香港人的起源和未來實際上與中國有緊密關係（獅子山下的奮鬥故事均與中國息息相關），帶出香港終究離不開中國的發展脈絡。借用拉克勞和洛芙的洞見，「獅子山」確實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流動能指」，不同政治陣營（不論是香港的資產階級、抗爭者或者中國內地的官方宣傳機器）均嘗試將「獅子山」納入其政治議程，從而

爭奪文化領導權。即使政治紛爭暫時落幕，但對「獅子山」符號詮釋權的爭奪似乎未見終結。「獅子山」被如何放置在甚麼的政治議程中，似乎亦暗示了香港未來的走向。

參考資料

Barthes, Roland,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Mythologies*. London, Paladin, 1972.

Gramsci, A. and Buttigieg, J., 2011.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 Press.

Laclau, E. and Mouffe, C., 2014.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Saussure, F., Bally, C., Sechehaye, A. and Baskin, W., 1960.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Peter Owen.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馬傑偉. 2011. 悼念霍爾：反思批判傳播學，《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9期（2014）：25 – 32。

黎國威. 2017. 「獅子山」：歷史記憶、視覺性與國族寓言，《二十一世紀》；161期(2017/06/01)，P84 – 101。

洛楓。1995。《世紀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香港交易所：<2001交易回顧>

<https://www.hkex.com.hk/chi/stat/statrpt/factbook2001/>

蘋果日報(2014年10月22日)，<獅子山上體現香港精神，我要直普選>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n.d.). 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 –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Retrieved December 5, 2022, from

<http://www.lionrockinstitute.org/2010/04/2010-03-07-08-46-23/>

零博客(2021). 獅子山作為表態標誌：「真普選」、「反送中」到「faith」。2021.Q3. Retrieved December 5, 2022, from

[https://agora0.gitlab.io/pen/21q3/stand/2021/07/06/STAND-](https://agora0.gitlab.io/pen/21q3/stand/2021/07/06/STAND-%E7%8D%85%E5%AD%90%E5%B1%B1%E4%BD%9C%E7%82%BA%E8%A1%A8%E6%85%8B%E6%A8%99%E8%AA%8C-%E7%9C%9F%E6%99%AE%E9%81%B8-%E5%8F%8D%E9%80%81%E4%B8%AD-%E5%88%B0-faith.html)

[%E7%8D%85%E5%AD%90%E5%B1%B1%E4%BD%9C%E7%82%BA%E8](https://agora0.gitlab.io/pen/21q3/stand/2021/07/06/STAND-%E7%8D%85%E5%AD%90%E5%B1%B1%E4%BD%9C%E7%82%BA%E8%A1%A8%E6%85%8B%E6%A8%99%E8%AA%8C-%E7%9C%9F%E6%99%AE%E9%81%B8-%E5%8F%8D%E9%80%81%E4%B8%AD-%E5%88%B0-faith.html)

[%A1%A8%E6%85%8B%E6%A8%99%E8%AA%8C-](https://agora0.gitlab.io/pen/21q3/stand/2021/07/06/STAND-%E7%8D%85%E5%AD%90%E5%B1%B1%E4%BD%9C%E7%82%BA%E8%A1%A8%E6%85%8B%E6%A8%99%E8%AA%8C-%E7%9C%9F%E6%99%AE%E9%81%B8-%E5%8F%8D%E9%80%81%E4%B8%AD-%E5%88%B0-faith.html)

[%E7%9C%9F%E6%99%AE%E9%81%B8-](https://agora0.gitlab.io/pen/21q3/stand/2021/07/06/STAND-%E7%8D%85%E5%AD%90%E5%B1%B1%E4%BD%9C%E7%82%BA%E8%A1%A8%E6%85%8B%E6%A8%99%E8%AA%8C-%E7%9C%9F%E6%99%AE%E9%81%B8-%E5%8F%8D%E9%80%81%E4%B8%AD-%E5%88%B0-faith.html)

[%E5%8F%8D%E9%80%81%E4%B8%AD-%E5%88%B0-faith.html](https://agora0.gitlab.io/pen/21q3/stand/2021/07/06/STAND-%E7%8D%85%E5%AD%90%E5%B1%B1%E4%BD%9C%E7%82%BA%E8%A1%A8%E6%85%8B%E6%A8%99%E8%AA%8C-%E7%9C%9F%E6%99%AE%E9%81%B8-%E5%8F%8D%E9%80%81%E4%B8%AD-%E5%88%B0-faith.html)

馬傑偉（2006）。〈市井國族主義：重劃大陸與香港的文化版圖〉，載於《香港。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獅子山下的故事》，2022年。